

目 录

1. 从母系族权圣物到皇帝奉天受命	1
2. 探索玺印的渊源	6
3. 巴蜀玺印概述	8
4. 中国的皇帝与宝玺	12
5. 从“和氏璧”到“传国玺”	15
6. 秦朝宝玺史话	19
7. 秦刻二玺与始皇五巡	23
8. 再谈中华第一玺	29
9. 汉朝宝玺史话	31
10. 跌宕起伏的两汉宝玺	34
11. 传国玉玺传了多久	38
12. 关于汉代“皇帝信玺”的质疑	40
13. 西汉遗珍“文帝行玺”及其他	43
14. 简谈汉朝存世的三方宝玺	47
15. 魏、晋宝玺综述	51
16. 南北朝宝玺综述	54
17. 南朝奇闻：宝玺如同接力棒	60
18. 隋朝宝玺综述	63
19. 历史上的符节	65
20. 唐朝宝玺综述	72
21. 唐朝的“中书省之印”及其他	76
22. 一方被《四库全书》搞错的宝玺	80
23. 五代十国宝玺综述	83
24. 历史上的两次“黄袍加身夺玺称帝”	89
25. 宋朝宝玺综述	92
26. 北宋宝玺透析	97

27. 南宋宝玺质疑	100
28. 宋朝大驾卤簿中的宝玺	102
29. 谈宝玺文字中的鸟虫篆	108
30. 说说宋朝宝玺中的“填以金盘龙纽”	111
31. 宋理宗铃印成双对	114
32. 探寻宋朝宝玺的最后踪迹	117
33. 寻觅宋徽宗的御用宝玺	121
34. 再谈西夏的“符牌”	124
35. 辽代宝玺综述	127
36. 金代宝玺综述	131
37. 金章宗与“明昌御览”宝玺	134
38. 元朝宝玺综述	136
39. 这是一方历史上的传国玉玺	140
40. 大元朝宝玺文字及规格的复原设计	143
41. 寻找元朝宝玺纽式的“元朝味”	147
42. 元朝太后摄政用“皇太后宝”	151
43. 元文宗与“奎章阁宝”	155
44. 明朝宝玺综述	158
45. “凝命神宝”与红崖天书	162
46. 秦始皇到底刻了几方传国玉玺	165
47. 明朝的“正嘉宝玺之毁”	168
48. 浅谈明朝的“崇祯御押”	172
49. “广运之宝”是明朝皇帝的专利	176
50. 关于故宫收藏檀木质“贵妃之宝”	179
51. 浅谈明朝宝玺的下落	183
52. 清朝宝玺综述	186
53. 一宝刻两朝 开启了“明宝清刻”的传承史	193
54. 历史上的“传国玉玺”	196
55. 从秦始皇的抛玺再现看历代秦玺复出	199
56. 元、明、清三朝的帝师玺印	202
57. 历代的圣旨与宝玺	208
58. 历史上的“制造之宝”	213
59. “天子六玺”史话	216
60. 历史上的“御前之宝”	218

61. 历史上的“皇太后宝”	222
62. 慈禧是历史上拥有玺印最多的后妃	227
63. 历朝宝玺的称谓	233
64. 历史上的御押宝玺	237
65. “皇太子宝”与清朝的建储制度	241
66. 清初御宝与《康熙会典》	245
67. 不入康熙《钦定大清会典》的清朝宝玺	249
68. 大清入关第一宝	253
69. 我鉴定过“康熙御笔之宝”	257
70. 介绍康熙的两组套玺	259
71. 关于大清朝三十九宝	262
72. 清朝到底刻有多少方宝玺	267
73. 寻觅大清宝玺的奠基人	270
74. 大清朝的“皇帝之宝”	276
75. 大清朝的闲章不闲	280
76. 康熙皇帝的御用宝玺	284
77. “敬天勤民”康乾盛世的治国根基	288
78. 雍正皇帝的寿山石宝玺	291
79. 酷爱印章的乾隆皇帝	296
80. 生日宝玺——乾隆朝的大手笔	302
81. 神秘的“乾隆御览之宝”	305
82. “乾隆链章”始末	308
83. 大清朝的宫殿宝玺	312
84. 清朝皇帝的贡品玺印	320
85. “三希堂”“快雪堂”宝玺及其他	324
86. 清朝诸帝御用宝玺的贮藏	329
87. 一组两岸共存的乾隆宝玺	332
88. 清朝的“传国玉玺”哪里去了	335
89. 探寻清朝失落的宝玺	338
90. 清朝帝后的谥宝谥册	343
91. 清朝道光帝、后谥宝及其他	351
92. 谈大清朝的檀木宝玺	354
93. 乾隆皇帝几乎一生都在刻制宝玺	358
94. 明清后妃的闲章及其翰墨情缘	361

95. “珍妃之印”与珍妃	365
96. 清朝皇帝的“御笔之宝”	369
97. 大清皇家的王爷印	372
98. 一组啼笑皆非的大清收官宝玺	377
99. 清朝乾隆、嘉庆、道光时的宫殿组玺	379
100. 昔日圆明园的宝玺都哪里去了	384
101. 1900 年京城寿皇殿的浩劫	388
102. “五福五代”乾隆的自豪	392
103. 历朝的“传国玉玺”都传了多久	395
104. 历朝皇家的书画收藏及鉴藏印	399
105. 历朝宝玺的“绶绶”及其饰物变革	406
106. 民国政府与清朝宝玺	412
107. 历史上镌刻过两套宝玺的人	415
108. 民国政府的“大总统印”	418
附录一 历史上极权的象征物“宝玺”之外还有“宝鼎”	421
附录二 “天潢演派”一方明朝皇室宝玺	426
附录三 南明永历帝的“救命之宝”及其他	427
附录四 清朝的“敬事房”印与太监	430
附录五 科举制度与“礼部之印”	434
附录六 太平天国玺印始末	437
附录七 吉美家族收藏的中国宝玺	441
附录八 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傀儡宝玺	445
附录九 宝玺走出国门及渊源	448
结 语	452

1. 从母系族权圣物到皇帝奉天受命

（兼述“玉猪龙”的称谓不确）

古往今来，凡是形成了规律的重大事物，必定都有其自然的发源、发展轨迹，历代传承的中华宝玺也不例外。

华夏先民在 8000 年前的中石器时代，为寻觅供打磨切削的石质砍斫工具时，就发现了更硬的石头——玉石。这件出土于新疆新塔拉遗址的石斧（图 1），就是选自当地的青玉石磨制而成，而在另外一地出土的斧形小石刀（图 2），一眼就能看出是由黄玉打造而成。因玉石的坚硬和其华丽温润的特色，先民们往往也将其做成饰物使用，当然这并非谁都能拥有。



图 1 石斧



图 2 斧形小石刀

这件约 7000 年前的玉猪龙（图 3），是 1988 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据北京出版社的《中国通史》记载：这件玉猪龙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玉器，一般是巫师主持祭祀活动或参与部落重大事务的礼器。”玉猪龙的名称，则是沿用了 1971 年内蒙古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约 6000 年前制造的玉猪龙（图 4），是这一称呼的自然延续。这件玉猪龙应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首领的族权象征，是佩戴在身边形影不离的圣物，因为当时的首领又多是为当族的巫师。为何将玉石打造成这个形状？又为何称其为“玉猪龙”？应是一段人类遗失的记忆。



图3 7000年前的玉猪龙



图4 6000年前的玉猪龙

多年前我也收藏到一件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经过长时间的盘摩把玩，这件已变得非常凝重温润的玉猪龙其实并不像猪也不像龙，但突然间我眼前一亮，这种已冠名四十多年的玉猪龙，不知被我的哪根意念神经触摸到了它的生命信息符号，直觉告诉我，这不能称为龙，而是一种符号，生命的符号，是生命的起源物——胚胎，还是胚胎的初期，任何动物的胚胎大致都是如此，与猪太不沾边，如果一定要向龙靠拢的话，顶多可称其为“胚胎龙”。顺着这个思路追寻，我们又从制作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龙形崇拜的礼器出土物中，得到了验证。不难发现，那件6000年前的玉猪龙，虽然往大发育了一些，并生长出鬃毛，尚未长出四肢，仍是胚胎龙；又过了1000多年的春秋时期，龙的形体还未发育完善（图5）；直到4000年前战国前期，龙才艰难地生出两只脚和长长的尾部（图6）；而能四肢行走发育成熟至体态丰满，则更要晚到千年后的战国后期（图7）；最后发育成长到2000年前的先秦，才变得活泼可爱了，但还不能称其为龙，而是称作“螭”，或螭兽、螭虎（图8）。待发展到可以称呼为螭龙时，我们还必须耐心等到1500年前的唐朝，而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小龙，但从此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正式称其为龙了。



图5 春秋时期的龙形



图6 战国时期的龙形



图7 战国晚期的龙形



图8 螭虎、螭兽

史前文明期的先民们，在其生活的各自部落群中，都有自己的崇拜物，如鱼、蛇、蜥蜴、虎、狼、猪等，将其皮或头骨悬挂在部落中作为象征，称图腾。后来他们又从洪水、闪电等自然现象中，臆想出龙的神物，于是又将自己的氏族崇拜物向其靠拢，称为猪龙、熊龙等。

从龙的胚胎，逐渐发育成长到成熟的螭龙，在先民们的虔诚企盼中，整整孕育了 5000 多年的悠悠岁月，真可谓宇宙间最为难产的神物了。也难怪我们中华民族对其如此钟爱有加，演变得日臻完善，将龙作为民族共有的图腾，并称我们自己为龙的传人。

4000 年前的古巴蜀国，就出现了雕有自己氏族图腾与象征纹饰的玉质龙纽玺印，专为氏族部落祭祀礼神等宗教活动使用，玺印外形或方或圆，形体十分硕大，所以只能放在祭祀场所的神坛或氏族宗庙里进行长期供奉。

2400 年前的秦始皇，统一中原六国，始称皇帝初制宝玺时，选用的材料就是玉石中的极品——和氏璧，而设计的纽式恰是五条相互盘绕的小螭龙。从此以后，无论是一步步成长壮大的龙，还是逐渐暮年衰老的龙，都成了当朝皇帝宝玺上，魔咒般的一成不变纽式，传承为“受命于天及奉天承运”的象征。这种世间所无而意念中永存的龙形，从母系社会族权的象征物，到后世帝王皇权的象征物，都是玉质与龙形的结合体，它们在华夏大地上足足演绎了 7000 年之久，像是冥冥之中的某个超能智慧体，在我们神州上空作总体遥控和全盘导演，把握得如此和谐，掌控得如此精湛，真是奇迹。

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对大自然中的一些现象，对自己的身体构造、思维活动都无法得到正确的认知，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概念，由此衍生了最初的灵魂崇拜、生命崇拜以及生殖崇拜。尤其在那种以生命为天、以生育为大的时代，怀孕及生育是部族发展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呵护女性，让生育多具有亲和力的年长女人充当部族的首领，主持日常事务活动，遇有重大事件再召集氏族大会决定。如果首领

不称职，氏族成员可以罢免她，这就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早期组织形式。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距今约 8000 到 6000 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步入母系氏族社会。当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进入了以苍壁礼天黄琮礼地祭祀天地、崇拜神灵的原始唯心主义时期。而同一时空的辽宁红山文化时期的先祖们，已懂得祭祀胚胎、敬畏生命、崇拜生育神，这就是最原始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维火花。

因为争战或病亡，他们偶然从女人或雌性动物体内，发现了这一生命的起源物——胚胎，认为这就是上天或神灵的珍贵恩赐，是值得尊崇的圣洁之物，因为他们懂得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在他们生存或生活的环境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伙伴。他们企盼生命渴求繁衍，遂将胚胎当成一种神秘而敬畏之物，再用珍稀的玉石艰辛地仿造出来，瞬间，就升华为至高无上的圣灵被推向神坛。这是女性生殖的骄傲，也是生育神的崇拜物。在巫师的手中更被推崇成天人对话的媒介，如果首领本人不是巫师的话，其他巫师引领祭祀时必须到首领处领取此圣物，才有资格进入祭祀场地进行活动，才能联通天人共话的信息频道，祭祀活动才有望成功，才能达到预先设想或者期待的效果。很有可能当年谁能登上氏族部落首领的宝座，谁就拥有胚胎龙。应该说这些出土的胚胎龙，都是那些首领死后，象征其尊贵身份的特许陪葬品。

在内蒙古喀左东山嘴一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曾出土了一些陶塑女裸像，躯体均具有孕妇特征，头部残缺。它们可能就是当时人们崇拜的“生育神”（图 9）。这些陶质妇女裸体塑像，是母系社会的象征物，具有女性或生殖崇拜的意义及母系社会女神崇拜的这一精神产物。

胚胎龙的出土发现，仅见于内蒙古赤峰西水泉、辽宁喀左东山嘴、辽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梁河一带红山文化遗址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而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址中均不见此物的出土，那么她们在母系社会的同一历史时空隧道中，是使用何种器物通过天人对话，进行祭祀或宗教活动的呢？原来因地域不同她们都有自己不同的专属神物，如：玉猪龙、C 形龙是红山文化的祭器；玉琮是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的祭器；玉圭始于夏商、兴于西周；六器、六瑞也形成于西周等。如今各地陆续出土的、大小不一、简繁不等的“玉璧”“玉琮”或是“玉琥”“玉璜”“玉璋”“玉圭”（图 10）等众多的玉制礼器，都是上古先人的孑遗。



图 9 生育神



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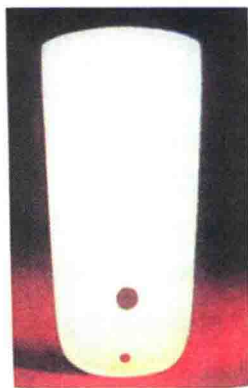
玉琮



玉璜



玉琥



玉璋



玉圭

图 10 玉璧、玉琮、玉琥、玉璜、玉璋、玉圭

2. 探索玺印的渊源

中国的玺印源远流长，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鲜明的特征，铸就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国内各地博物馆里，收藏着数十万计的中国历代玺印珍品。从明清官玺到各流派印章，沿着历史朝代逆行，一直上溯到春秋战国的公私玺印及将军印，这绵延 2000 多年的玺印历史，就是中国玺印文化发展的辉煌史。

1928 年开掘殷墟商代大墓时，民间商贾发现了三方“安阳铜玺”（图 11），曾引起了考古界金石界旷日持久的讨论。专家董作宾、严一萍先生认为，这三方铜玺有纽、有穿、印文呈反向，足以具备玺印的形式，可能是商代的玺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玺印实物发现。这三方商代铜玺的出土，将中国玺印史的源头，上溯到 3000 多年以前。如今，这三方铜玺除一方失踪外，其他两方都收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接着，海峡两岸学者，对这三方玺印的研究从未停止，近年，大陆学者王廷洽发表新的研究成果，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一、“安阳铜玺”确实是玺印；二、“安阳铜玺”是商代的氏族徽记，他已经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得到印证（图 12）；三、“安阳铜玺”是烙印奴隶脸部记号标识的工具，奴隶也是氏族的财物，烙有此印记的物品就是本氏族财富的凭证。



图 11 安阳铜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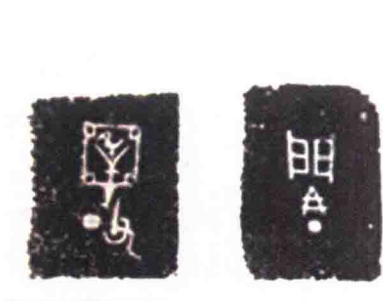


图 12 氏族徽记

《左传》载：“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说的就是当时鲁国官员公冶，受命去卞邑了解情况，忘记携带国君的凭信，于是国君派人持玺书“追而与之”。“玺书”就是钤盖了王印的国书，是代表国王或国家的信件。由此足以说明，当时玺印的征信作用与现代等同，距今约 3000 年。

《四库全书·子部八·印典卷一》载：“晋百官志云，王，古号也。夏、殷、周称王。金玺龟纽。细纁朱绶。”这段在正史中没有记载的资料，就是说，中国的玺印从夏禹时代就有了，距今已有 4000 多年历史。是王权的象征物，主要用于祭祀。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载：“桀败于有娥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朥，浮厥宝玉……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这是《史记》中一段关于殷汤灭夏桀，获其宝玉而登极做天子的记载，距今 4000 多年的历史。这里的“宝玉”当指玺印，应是夏桀的玉质王印。如清朝乾隆御制《增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三载：周武王十三年克商后“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又如《元史·卷四十七·顺帝十》载：“至正二十八年五月，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地里八剌及后妃、宝玉皆被获。……”说的就是元顺帝皇孙、后妃、宝玺全部被明朝官兵袭击应昌府所获取的史实。这里的“宝玉”当指宝玺。《史记》，是西汉司马迁写的，《元史》，是明朝宋濂写的，两人相隔 1600 多年，而御题《增批历代通鉴辑览》的乾隆朝又延后了几百年，他们同将“玉玺”称作“宝玉”，看来这就是历史统称的延续。

《印典·故事》载：“周书，汤放桀，服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再拜。曰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说的也是殷汤获夏桀宝玺这件事。

《历代通鉴辑览》卷三载：周武王克商后，“展九鼎宝玉于南宫”。说的是周朝又继承了商朝的九鼎和宝玺。九鼎也是自“夏禹四岁铸九鼎”，而传承至今，九鼎、宝玉都是为王的象征和凭信，以此表明周得天下。

从以上正史、野史几段史料的记载分析，足以说明中国的玺印，至少在 4000 多年前的夏朝就已经在正常使用着。究竟何时起源，囿于史料记述的局限，已无文字上溯可寻，只能依赖对出土实物的研究了。

《中国通史》载：距今 6000 年前，仰韶文化一期的半坡遗址中，曾出土了一批带有数字刻符记号的陶片（图 13）。经专家辨识，这些刻画符号与后期的金文、甲骨文中的数字，有着某种内在的演化发展关系。我认为，这就是孕育玺印诞生的前兆和温床。因为想要大量成批地快速在陶器上刻画出同一形式内容的符号，聪明的先人已经使用“印模”进行操作。而这些“印模”就是玺印的先驱，当然还不是玺印。



图 13 刻符号陶片

3. 巴蜀玺印概述

古代的巴、蜀，是历史上氏族部落间争斗、吞并、联盟过程中形成的两个王国，始于五帝时期，巴在川东、鄂西，蜀在川西，以后又统一称古蜀国。公元前 316 年蜀为秦所灭。



图 14 伏羲女娲帛画

据《春秋世谱》载：风尧部落女首领华胥氏，是我国上古时期的母系氏族部落首领，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母，也是“中华”一词的来源。华胥氏生伏羲和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按：后世因文明渐进，诟于兄妹成婚繁衍后代，故正史隐晦。但汉代画像砖及唐朝绢画、帛画（图 14），均留下了历史的记忆。另外《中国通史》中的“女娲造人”等信息资料，又是一个影射。

又据《山海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段话表明：伏羲、太昊的一支后照，是巴人的祖先，即巴人源于东夷太昊族。又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氏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为云嚣，是为青阳，青阳降于江水。其二为昌意，降于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景朴，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

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继位，是为帝颛顼也。”需要说明的是，早期黄帝氏族生活在今华北、东北的一部分，这里的“蜀山”不是四川的岷山，而是山东汶上县西南的蜀山，蜀山氏是生活在该区域的氐、羌族的一支。文中的江水、若水也在山东，不是四川的江水、若水。到帝颛顼时，地域范围扩展，才将其母蜀山氏一支封往川西平原，古蜀国也从此获名曰“蜀”。因嫫祖发明养蚕、丝织，有“蚕丛”之名，蚕丛氏

就成为古蜀国第一代统治集团，其时间尚在新石器晚期的唐、虞时期，蜀国历经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几大氏族统治时期。

古代巴国，继承了新石器时期江汉地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距今 6000 年前已跨入了文明的里程；古蜀国，也在 4000 年前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它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唐、虞、夏、商、周全过程的悠悠岁月。

这里收集了几方巴蜀玉质玺印，是众多出土巴蜀玺印的代表，其中有巴蜀图形印、巴蜀符号印、巴蜀文字印等，都是属于巴蜀开明王朝的巨型玺印，体量较大、粗犷优美、十分珍贵，极具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从这些玺印的造型上看：有一方平顶金字塔祭坛形方玺，玺面 16.5 厘米见方，通高 10 厘米，重 6.3 公斤，青玉质全沁色，呈深红色有黑色斑纹，蜡状光泽奇美异常（图 15），另有一方还是鳖灵王方玺，印面 9.5 厘米见方，通高 9 厘米，青玉质全沁色，通体灰色包浆。印纽是古蜀开明王朝的建立者鳖灵王图腾物（图 16），这两方玺印的印面图案，都是以礼乐供奉开明王，当是设置于宗庙内祭祀时所用的礼器之一。



图 15 鳖灵王大方印



图 16 鳖灵王方印



还有两方巨大的圆形玺印，一方印面直径 24 厘米，通高 9.3 厘米，重 7.3 公斤，青白玉质，有棕色沁斑，有灰皮，印面有边框，白文，刻有鱼凫、白虎、碧鸡、比翼鸟、日、星、火等氏族图腾标志及以心祭祀的符号（图 17）。另一方玺印直径

20 厘米，通高 10 厘米，重 5.5 公斤。优质青玉，全沁有灰皮，通体棕灰色沁斑。印面有边框，白文，刻有鱼鳧、白虎、共族、火族等图腾标志及以血祭祀的符号（图 18）。这两方玺印，其球台状的印台，是天穹的表示，也是圆形祭坛的形象，印面为巴蜀氏族图腾徽铭与祭祀符号的阴刻，如半“亚”字形的宗庙符号和“羽”祭、“血”祭符号。印纽都是姜源氏族图腾物蜚螭的造型（“蜚螭”，也是“龙”的早期造型之一），印文中有“王”字及半“亚”字形符号，均表示由王所赐。这两方巨玺也应是放置宗庙或者祭坛之用的祭祀礼器。



图 17 巴蜀文大圆印



图 18 巴蜀文圆印

“大和后母辛貔”玺（图 19），印面 13.8 厘米见方，通高 11 厘米，青玉质，遍布沁斑。印面是氏族的金文徽铭，印纽为一卧姿飞虎，是其氏族图腾。太和、后母辛、貔，都属虎族，应是虎方徐国的虎族，也是氏族后人设置于宗庙祭祀所用。图 20 是一方“金巴文混合印”，印面 13.8 厘米见方，通高 7.2 厘米，青玉质，表面有融化现象，印文为金文，只有火字是巴文。印面左右两侧是“王母”二字，中间是“册、舟、火、古竹”。此印为古竹联合母系氏族置于宗庙的祭祖之印。图 21 是一方“人物纽方形印”，该人形似舞者，饰有一双巴人祭祖时常用的虎耳，足穿月牙钺形靴，更像是一位巫师。印面文字为一咒符图形，此印也与某种祭祀或巫师有关。



图 19 大和后母辛癸玺



图 20 金巴文混合印



图 21 人物纽方形印



纵观巴蜀玺印，是中华玺印先驱的一部分，是华夏民族的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充分体现，主要用于氏族祭祖的宗庙或祭坛，是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这些玺印与秦始皇以后历代王朝的玺印功能不同，自秦以后，历代王朝玺印都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商周时期的铜鼎、宝玉代表国家最高权力，而巴蜀王朝则以金杖代表王权。

以玺印形式祭祖始于巴蜀等古国，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时期，《后汉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流传于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配合西周时期施行的谥号制度，又刻制成玉册、玉宝以祭祀先皇先祖，这一制度一直传至清末，延绵了中国历史上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全过程。

时至今日，国人不是仍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吗？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有图腾。而共和国公章上的国徽图案（图 22），就是当今中华民族统一图腾的玺印再现，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历史呼应与延续。



图 22 国徽图案印

4. 中国的皇帝与宝玺

中国皇帝（图 23）与宝玺（图 24）的产生，始自秦始皇嬴政。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前称“秦王”，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国君都称“王”。所谓“王”者，按董仲舒的解释是：它的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穿三者的“天下所规往”，称“王”者即表示天地间的一切都属于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犹嫌“王”的称号和含义不足以彰显尊贵。他曾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令大臣们“议帝号”。议论的结果是：昔者，五帝地方千里，还不统一；今天下平定，海内皆郡县，法令也一统，是三皇五帝所不及。秦王嬴政也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决定取三皇的“皇”字，五帝的“帝”字，合二而一称为“皇帝”。



图 23 历朝开国皇帝

至此，“皇帝”就代替了“王”，而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称，一直延续到清亡约 2132 年之久。而代表其神圣权力的凭信物，就是皇帝的专用“玺印”，玺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通常只有皇帝的印称玺，或宝玺，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宝玺属于公章。历代伴随皇帝的更替和传承。凡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各种诏书文告时，皆钤盖宝玺。对皇帝印章的分类、管理和使用，各个朝

代都有十分严肃的规定。皇权更替的标志，就是宝玺的转移。



图 24 中华宝玺一组

中华文明是多民族文明，是域内各民族智慧的总汇。多民族共同参与创建的文明，构成了皇帝与宝玺制度的多民族色彩，特别是鲜卑、契丹、北胡、女真、蒙古、满族等入主中原，建立封建王朝，每次都为这个制度增添新的民族特色，强化其各自的统治力度。不了解“皇帝”与“宝玺”制度，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华古代文明和中国历史。

皇帝与宝玺制度，是十分神秘的。封建王朝，宫深似海，种种禁忌与祖制更使其成为一种难以琢磨的现象，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就会看到一个充满凶险与爱憎的森严世界，一个个皇帝的更替、后妃的荣辱、弄权的奸臣、潦倒的宦官，以及生前的凄凉与死后的殊荣……制度的冷漠与人生的悲欢都在这里周而复始地演绎与咏叹。

中国封建王朝，曾以其特有的“皇帝”与“宝玺”制度统治中国，也以其缜密的手段维护着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安定，保持了中华古文明的连续性。自秦始皇创建了皇帝与宝玺制度后，至清王朝覆灭的两千多年间，占据了俗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半时间里，其中秦、汉、隋、唐时期的发展与统治，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农业文明的最辉煌时代就出现在这一阶段。中国文明遥遥领先于世界也是在这一阶段。在这中华文明独领风骚的上千年历史时期，皇帝与宝玺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这种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系着中华文明在种族上、文化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融合，使中国文明成为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统一多元的连续文明，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农业文明曾一度造就了中国的特殊地位。但它不是最先进的文明，也曾阻碍过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世界先进国家开始选择工业文明的时候，而中国封建统治者却在费尽心机地强化着皇帝与宝玺制度。皇权统治天下，国运系于一人，昏君又多于贤君，终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皇帝与宝玺制度不合时宜地强化和凝固，阻碍了社会发展，又使国民思想僵化，社会毫无生机，皇权至上的独尊意识，万邦来朝的思维习惯，最终又导致了近代社会中历史进程的速度与模式的差异，乃至现代文明的差异。